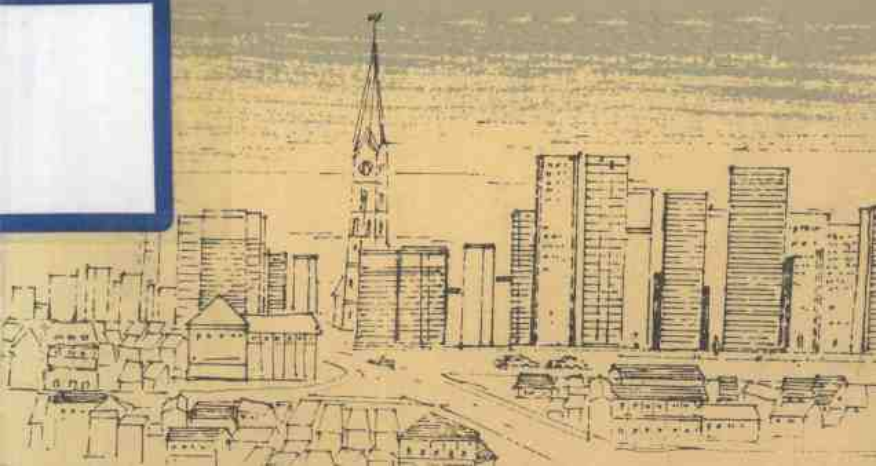


香港淪陷 日記

薩空了



香港沦陷日记

萨空了



三联书店
1945年12月

据进修出版教育社
1946年版修订。

香 港 沦 陷 日 记
XIANGGANG LUNXIAN Riji

著 者：萨空了

封面设计：马少展

出 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发 行：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787×960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02,000字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7,000

书号 10002·52 定价 1.00 元

再 版 前 言

三联书店的同志找我商量重印《香港沦陷日记》一书，这引起我对四十多年前往事的回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由于“盟国”内部各有打算不团结，放纵侵略势力又麻痹轻敌毫无作战准备，致使珍珠港惨遭日军袭击，南洋各埠受到日军进攻，香港也遭日军围困。

当时，中国和英国同属“盟国”，是站在同一反法西斯战线上的。因此，许多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怀着同仇敌忾的心情，志愿参加香港的防护团(ARP)，准备和英军一起奋勇迎敌。不少知识分子谋求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群策群力解救香港的危难。社会舆论也是支持香港当局抵抗侵略的。但是香港当局却从战争一开始就显出怯懦和犹豫。

居住在香港的英国人是愿意和中国人合作对敌的。如E. 邱茉莉女士就曾在炮火纷飞的情况

下，热心地支持、主动去找当时的港情报部长（D. M. MacDougall）帮助我们办联合报，后来又帮助我们和香港华民政务司那鲁麟（North）和香港著名英籍华人罗旭龢爵士取得联系，力图使中、英人民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日寇的侵略。但是得到的答复是“太晚了”，因为香港当局已经准备投降了。

记得在香港濒于沦陷的时候，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曾被中、英文报刊发表的关于中国军队进入深圳的消息所鼓舞。在英军增援无望，日寇节节进逼的情况下，中国居民殷切盼望中国军队能解香港之围。由中国人自己来解救被英国占领、租借的中国土地，这是何等扬眉吐气的事。然而，这是幻想。香港当局既不敢武装中国居民御敌，又不敢联合中国军队抗日，最后只好举白旗投降。

这本日记写于一九四三年，反映的是一个爱国的进步新闻工作者眼光下的香港沦陷前后的情况，它必然会有历史的局限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当今动荡不安的世界形势下，重新回忆这段历史，也许会有一二可借鉴之处吧！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八日

前 记

这本书现在拿到香港来付印，完全是我自己都未曾想到过的事。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在桂林把它写完，想即付印，不料在五月十七日我就被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广西支局——广西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的两个特务，用汽车给绑架了去，幽囚了两年零一个多月，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底，才恢复了自由。在被囚的期间我曾以不同的笔名写印了几本书，维持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活。但是这本书，却因为写时未曾想到自己会失掉自由，记述的口吻不适于用笔名发表，遂失掉了出版的机会。以后我被特务由桂林押解到重庆，这本书的原稿下落如何，我都不知道了。恢复自由之后，才知道它辗转了三四个朋友的手，幸得保存。尤其应当感谢的是一个外国朋友，他为我负责由桂林带了出来，不然，在桂林沦陷时，它也许和桂林的建筑一样，完全化为灰烬了。

我写这本书的序时，曾说希望它有助于盟军的收复香港，谁知道它竟要到香港收复后，我又回到香港来，才有付印的可能。时候拖的这么久，这本书可说是只剩一点史料的价值了，不过这原稿终能幸存的曲折故事，益增了我敝帚自珍的心情。所以决定无论如何要将它印出。

在决定付印前重读了一次，我个人的感慨不是很短的话所能说完的。当时在香港共同奋斗的战友，已死掉了韬奋、羊枣两兄，一九三八年和我一同离港去新疆的杜重远兄，也在这期间内被杀于迪化，至今尸身何在都不知道。为民主而战的自己最熟的朋友，几年中已失掉了三个，在失掉自由期间从难友口中所听到的被屠杀的不知名的民主战士更多到不计其数。不过他们的死亡是有代价的，在这本书中，为求在国内出版而未曾公开写出的中国民主同盟，现在已在国内成为正式被承认的政团了。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开成，中国和平民主建国的计划可说已经拟定，只等待我们去努力求其实现了。这在中国当然是一种极大的进步。这些民主战士们，地下有知，知道他们的死亡已换到这样的代价，他们也会感到安慰吧？到现在感到不安的，倒是我们这些后死者。继续他们的遗志，推进中国的民主运动，宣扬他们一生的战

斗成绩，激励未来的战士，这都是我们的责任，可是我们现在所能作出来的却太有限了。我现在印了这本书，但为了迁就写时的环境，把最初在香港对全世界对全国人民宣告中国民主同盟已经成立的工作者的战斗事迹，说的太不具体了，很想从新痛痛快快的写过，可是眼前的工作逼得非常之紧，实在无从如愿，只好就叫它这样与读者相见。读者说不定还可以在字里行间找到一些侧影？那么这本书的印行，也许不算是全无意义，然而在我自己心上，总还是感到非常的遗憾。

希望中国的民主运动能够在短期内有更大的进展，使我们能够在战斗中略有喘息的机会，来好好的写些纪念战友的文字吧！但这希望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在今日是无从估计的，不过我们努力以赴，想总不会太远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

序

这本书是当香港九龙为日本法西斯强盗占领前后那个时期，我个人的日记。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进攻香港起，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我逃出香港止，历时共四十九天。

纪录港九陷落的报告，市上已有两本书印行，在报纸上发表过，没印成单行本的报告更多，那都是在一九四二年春发表的。我这个日记迟至一年后才写成，又迟了几个月经过一度修改才决定付印。从书商生意眼的眼光来看，这日记写出来的时间是太晚了，大家对香港九龙的沦陷，已不若一九四二年春那样注意，销路怕不会多。而在我自己来看呢，这日记在现在发表，还是太早，因为太早，遂不能不影响了它的内容。我的原意本打算在战后再发表，那时说话似乎更比较客观。可是为什么我又改变初衷，在现在想把它付印呢？简单的说是一种“敝帚自珍”的心情造成我这新的决定。

我从正式到报馆作编辑到如今，已过了十六年以上的新闻记者生涯，这职业，在中国依照社会习惯本是一种被民众内心里贱视，表面上却要恭维的职业，大致和讼棍在社会上的地位差不多。而北洋军阀之类的当政者，对付记者的办法，则是一只手拿着钞票，一只手拿着手枪，不怕你不屈服。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新闻记者如果有良心，有主张，有骨气，有斗志，即使侥幸不成为殉道者，也必然的要弄的遍体鳞伤，而且在你死之前，有的是无穷的艰苦日子在等待着你。——当一个国家步入真正的“民主”的过渡时期，这本是新闻记者无可逃避的历史的责任，我既生在这样的时代中，又选定了新闻记者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自只有坚强的负起自己应负的历史使命。所以自从作了记者以来，兢兢业业的工作，惟恐走错了路。我常常警告自己，不应把自己所编出来的报纸，当作翌日即是覆酱瓿的烂纸，而应当把它看成那是组成人类历史记载的一部分。假使不能将亲历的一切，忠实的写出，那我们就是那些伪造历史者的帮闲，即使出于无心，也是罪无可逭。因此抗战以来，每逢遭遇到一个重大的事变，我即每天写一点自己认为应当记下来的材料，那些也许是当时不能发表的，但希望在将来有一天，我能将自己亲历的一

切写出来，供给修史者参考。

不幸的是近几年来生活太流动，几度的逃亡流徙，什么东西都渐散失，最使我心痛的，是八一三上海陷落前后，我所写的日记的全部遗失，和我由香港到新疆途中所写的日记的部分佚散。而且以目前个人的环境来讲，流徙生活，仍在继续之中，怕在香港所写的日记又复散失，遂乘着枯居桂林，无事可作的时候，把它陆续整理出来。整理出来后，卷帙更多，自己更难保存，遂兴印行的意念，为了印行，大加删削一次，就成了今日这本日记的面目。

这会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么？供给了多少值得保存的材料？我自己都不能答复，而是要由读者代我答复的。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差可告慰读者，就是在这四十九天的日记中只有因为写的太早而未写出的材料，至于已写出的材料，都是亲见亲闻，可凭征信。对于敌人罪恶行动，我也没有特加渲染，一切都是如实写出，大家到现在已都知道在新加坡，日寇对华侨特别酷虐，在香港对华侨却相当怀柔，那并不是他们对香港华侨有好感，而是以一种政策为中心，而形成的不同手段。所以我的报告，也许有可供研究敌情者参考的地方。此外也有些我谈到了我们的盟国——英国，在港行

政官吏的弱点，但那决不是攻击，而是指出我们自己应当知道的自己的缺欠，在盟国反攻时，它也许会有点参考价值吧？……至少在我自己的心上有着这样一种期望。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桂林

目 录

再版前言	1
前 记	3
序	7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1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

至一月二十五日 111

一九四一年

十二月八日 星期一

早八时，刚刚起床，突然凄厉的警报笛声四起，连日香港本在紧张的神经战空气中，不断的防空演习，一道道的紧急疏散命令，但在传统的大英不可侵犯的傲气氛围中，香港居民几乎没有人肯信日本真会侵袭香港。就是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人们也不相信，日本会在一九四一年发动太平洋战争。所以这一天的警报传出后，全港居民，谁都以为又是防空演习。接着很清晰的轰炸声音在九龙的东北角爆发，上空嗡嗡的飞机声，跟着也历历可闻。家人是在重庆饱尝大轰炸经验的，都喊着这不象是演习，并集中到全楼比较玻窗最少的夹道中来。我默念着，“恐怕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再想到自己肩负着的光明报的责任，已顾不及躲避空袭，只想立刻走出去打听打听真象。穿着睡衣走入盥漱室，一盆洗脸水还未由自来水的龙头口放好，门外突然有人在极紧张的敲门。家人，女

仆，没有人敢去应门，我自己跑了去，门甫打开，一支手枪已指对着我的胸膛。

“还有日本人住在这里么？”是一个英籍警察用英语询问。

我回答说“没有！”

“那么你跟我走吧！”

“那里去？”

“警署！”

“至少我应洗洗脸，换了衣服，”我指着所穿的睡衣给他看。他讲“要快”，我遂重到盥漱室；英警举着手枪也跟了来，我拿起剃刀要修面，他阻止我说“你可以带了剃刀走，还可以带一个放替换衣服的衣箱。”我匆匆的洗了脸，然后到卧室换衣，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我去警署，我以为这或者又是由于一种诬陷，从到香港之后，我已经经历了许多类似的情形，所以只预备到警署再申辩，因为，和一个警察争辩是没有用的。英警再跟我走进卧室，还是手枪在握，家人都集聚在一旁，暂时忘了外面的紧张，而改注意到室内，在我俯首穿鞋的时候，那英警忽然问我有否移民证，我找出来给了他，他仔细阅读了移民证后问我：“四川”是中国还是日本？由于这个启示，我陡然忆起，我住的房子，三个月前住的是一个日本人，大约他以为我是日本人才来

逮捕吧。我遂告诉他我是中国人，过去这个房子曾住过日本人，但是久已搬走了。

英警收起了手枪，然而在收起之前他还用手枪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说：“如果我证明你不是中国人，下次再来时，我就要不客气的使用它了！”不等我再说任何的话，他已冲下楼去。我赶到骑楼，看见一辆警署的囚车正在缓缓的驶走。

这一场喜剧插曲使我更坚信了太平洋战事业已爆发，否则英警决不至逮捕日人。匆匆嘱咐家人多买一些食物之后，便到斜对面的范长江兄住所，一面想利用他的房东的电话，一面想听听他已获到了什么消息。走上三楼，他也还穿着睡衣，问有什么消息。他仍说据报告是演习。我把我所遭遇的喜剧告诉了他，他也想起来适才就在他的对面北京道上，有一家日本商店为英警破门而入，但日人已全部逃走。各方印证，想来战事业已开始。他连忙也穿起了衣服，决定同我一起过海到香港去。下楼的时候，遇见了才由香港过来的秋江兄，他带来了日本对英美正式宣战的消息，并说港九交通，政府已有新命，由香港可以自由过九龙，由九龙过港，军人而外须先到亚士厘道西人青年会旁门领通行证。

走到尖沙咀，证实了秋江的话，回到西人青年

会已挤得水泄不通。那时正是早九时，住在九龙的香港各机关职员都应在这时上班，大家全过不得海，可是都希冀或者可以通融，不肯折回，于是尖沙咀似乎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场面。九龙公共汽车照常行驶，由九龙城深水埗来的车，带来了启德机场，深水埗英兵营及其附近被炸的消息，更增加了这些群众的骚动。汉口道的几家面包店，因为香港政府业经下令统制粮食，黄油面包已须排班候买，不到一小时，各店完全宣布售罄。向隅的大有人在。

我知道候渡轮已没有了希望，便拉长江去看平时每小时二元的汽艇是否还可搭乘过海。在九龙仓前的汽艇码头旁，我发见了不只有汽艇还有舢板，在招揽客人过海。也就在一瞬间我发见了生活书店和读书生活社的徐伯昕和黄洛峰二兄同在那里待渡。待渡的人非常之多，每一只船靠了码头不论是汽艇还是舢板，都立即挤满了人，我和长江挤在人群中去竞争，我挤上了一条汽艇，再看他，却和徐黄二人挤上了另一只舢板。我的汽艇，十分钟后便在香港皇家码头靠了岸。他们的舢板后来听说走了约一小时才得过海，因为那天海面上有小小的风浪。在汽艇中同渡的人，从他们的交谈中可以听出来，多半是中央信托局派在香港